

胡德坤 主编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 第三卷 ❀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关培凤 | 著



人民出版社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 第三卷 ❧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关培凤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Contents

※ 第三卷 ※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引 言	1
第一章 中国努力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29
第一节 建立反日国际同盟思想的发端	29
一、九一八事变后民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测	30
二、民众对中国应战方针的讨论	32
三、国民政府的反应和对策	35
第二节 建立反日国际同盟思想的确立	40
一、建立反日同盟思想的确立	41
二、早期的外交努力	44
第三节 努力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55
一、抵制西方国家的对日妥协	55

二、谋求并推动联盟的建立	63
第二章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	71
第一节 中国对盟国的军事配合	71
一、具体的军事作战	71
二、服从盟国先德后日大战略	76
第二节 加强与盟国的外交合作	88
一、蒋介石调解英印关系	88
二、宋美龄访美与中美合作的加强	94
第三节 中国赢得大国地位	101
一、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的签订	101
二、参加签署《普遍安全宣言》	109
三、出席开罗会议	113
第三章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维护	118
第一节 中苏分歧及其处理	118
一、新疆问题与中苏关系转冷	119
二、中苏关系跌入低谷	126
三、中苏分歧的处理	129
第二节 中英分歧及其处理	134
一、中英两国间的主要分歧	134
二、中国努力化解中英分歧	140
第三节 中美分歧及中国的应对	146
一、分歧初现与中国的对策	147
二、纷争再起与中国的反应	152
三、史迪威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调整	157
第四节 中国与联合国的成立	163
一、中国民众关于建立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讨论	164

二、中国政府关于建立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主张与实践	167
三、中国在联合国成立过程中所作的贡献	171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183
第一节 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183
一、大力呼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	183
二、揭露和抵制远东慕尼黑危险	191
三、西方远东绥靖政策对中国共产党联盟思想的冲击	193
四、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196
第二节 努力巩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199
一、加强与美、英、苏等国的联系	199
二、全力支持盟国先德后日战略	207
第三节 努力加强与盟国的关系	212
一、建立与美国官方的联系	212
二、赫尔利调解国共关系	218
三、密切与苏联的关系	224
本卷综论	228
参考文献	246
后 记	256

引言

一、学术前史介绍

众所周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和存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以民主国家的胜利、法西斯国家的覆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四大国之一,不仅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对前者的研究,国内已有很多成果,但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目前在国内外尚不多见。事实上,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先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国最早举起了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大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独立抗击日本的疯狂侵略长达四年半之久。在这段漫长而苦难的时期,中国深深地感受到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并为此积极奔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作为四大领衔国之一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家宣言》,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国家之一,并以这种身份活跃于联盟此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然而,学术界对中国与反法西斯联盟关系的研究却相对薄弱,^①这对于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无疑是一种缺憾。

关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关系,迄今国内外尚无专门论述,这里的

^① Saki Dockrill 在为纪念珍珠港事件 50 周年国际会议论文集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人如何认识自身在与日本的战争中的作用或如何认识其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与英国和美国的关系,这是欧洲人知之甚少的问题”。见 Saki Dockrill, *From Pearl Harbor to Hiroshima, The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941 - 1945*,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4, p. 4。十多年过去了,这种状况虽已有所改变,但研究仍很不够。

研究综述只能介绍与本卷内容相关的成果。^①

(一) 国内学者研究概况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除了在一些通史性著作中,如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等著作,有部分中外关系的论述外,没有任何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专著。专门的学术文章也不多见。一些零星的研究涉及的主要是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英美对日绥靖等问题。^②

改革开放以来,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迅猛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涉及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1) 外交通史类著作: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中国大陆出版最早的一本外交通史。该书运用了的中外档案文献,受到学界好评。石源华撰写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一部极具特色的民国外交通史,该书不仅史料丰富,而且研究方法新颖,评述公允客观,受到国内外学界较高的评价。此外,还有宗承康主编的《百年中国对外关系(1840—1949年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唐培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胡之信、张德旺等撰写的《中国革命中的国际关系(1919—1949)》(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杨公素著的《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等。

(2) 抗战时期专题外交史著作:苏光文主编的《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主要从政治外交、对外军事关系和对外文化交往三个方面论述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王真撰写的《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共同各国的交往。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

^① 国内研究状况介绍重点参考了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陈谦平《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陶文钊《民国时期中美关系史研究述评》和李嘉谷《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研究述评》(见曾景忠:《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德军《抗日战争研究述评》之第22章《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齐鲁书社2005年版),特此感谢。

^② 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

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则是一部学术性、史料性均堪称一流的著作。该书叙述了从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到 1945 年抗战胜利期间的中外关系,包括中国抗战与国联,中国与德国、苏联、英国、美国、日本的关系。该书认为战时中国外交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抗战相辅相成。此外,还有王建朗著的《抗战时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版)、沈庆林著的《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王真著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等。

(3) 双边外交关系著作:王洪主编的《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任东来的《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李嘉谷的《合作与冲突:1931—1945 年的中苏关系》、曹振威的《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的中日关系》(以上专著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1996 年间出版)、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等。此外,还有罗志刚的《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陈谦平的《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等。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虽然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是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中美关系,但战时中美外交关系占到了一大半的内容,无论从写作技巧还是研究重点上讲,都堪称杰作。

(4) 以人物为切入点展现外交关系的著作:如项立岭的《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史迪威研究中心编的《史迪威将军与中国》(重庆出版社 1992 年版)、岳谦厚著的《顾维钧与抗日外交》(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金光耀主编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陈永祥著的《宋子文与美援外交 1931—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等。

除了学术专著外,国内学者就战时中国同各主要盟国关系的研究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研究层次也比较多样化,既有双边关系、多边关系的研究,也有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总体研究,还有关于外交人物的研究。值得一

提的是,还出现了一些直接有关反法西斯联盟问题的论文,如张齐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的作用》(《衡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3期)、赖悦的《英美苏三国联盟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惠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余龙生的《关于反法西斯联盟关系的演变及其历史反思》(《上饶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6年第4期)、杨宝康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2期)、杨竹芬《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结合》(《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祝中侠《关于二战期间苏美英结盟的几点思考》(《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等。尽管从总体上讲,这类研究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且发展也比较缓慢,但毕竟是对外交关系研究中一个新领域的开辟,也属难能可贵。

从上述对以往研究成果的介绍可以看出,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专著和论文相当多。这些著作和论文涉及战时中国外交的许多方面,此处不能一一罗列,只就引起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介绍。

1. 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中美英关系

一般来讲,人们认为这一时期的英美对华政策具有对日姑息和援华制日的两面性,且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扩大和对英美在华利益日益严重的损害,援华制日逐渐成为主流。1938年的桐油贷款是美国政策由对日妥协为主转向援华制日为主的一个最初的转折点,这一贷款成为中美走向共同抗日之路的第一步。从这时起,美国明确把中国看作阻止日本进一步扩张的第一道防线。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条约签订后,美国政策进入积极援华阶段。^①在对英美对华政策的评价上,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是:绥靖日本与援华制日,哪一方面是这一时期英美对华政策的主流。一些学者认为,对日绥靖是英美远东政策的基调,是主导方面。英美纵容日本侵略,把大量战争物资卖给日本,而在制裁日本问题上回避躲闪。当日本准备南进时,又企图以牺牲中国来与日本妥协。英美为了在中日战争中获得更多利润和维护自身的安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对日姑息是主流,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战才使这种阴谋破产。刘天纯甚

^① 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章。陶文钊:《中美关系史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至认为,以瓜分中国为中心的、完整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活动,贯穿于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全过程中。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是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准备阶段,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是疯狂实施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是余波阶段。^①但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尽管在相当长时间里英美对日存在严重妥协,但并没有构成远东慕尼黑阴谋。英美在远东对日本作出的妥协,无论在动机、程度和后果上都不能和欧洲的慕尼黑阴谋相提并论。因此,不能把任何局部性的旨在阻缓日本侵犯其利益的妥协都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英美远东政策的主流是援华制日。^②研究者还注意到,英美的远东政策有所不同。比较起来,英国对日妥协的程度要大一些,1938年的英日海关协定、1939年的《有田—克莱琪协定》、1940年的封锁滇缅路事件,都是严重的对日妥协行为,是英国绥靖政策最明显的表现。^③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为了抵消英国妥协的消极影响,对日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措施,如英日达成《有田—克莱琪协定》后两天,美国宣布废止1911年2月订立的日美商约;英国封锁滇缅公路后,为抵消这一事件的冲击波,罗斯福于7月25日宣布对航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等的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④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对日作战处于孤军奋战之中。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中心是争取外援,包括道义的和物质的援助。为此,国民政府采取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国、争取友邦的外交方针,求援对象多样化,不仅限于欧美国家,还率先打破意识形态束缚,改善同社会主义苏联的关系,争取其积极援助。国民政府在争取欧美外援的过程中屡屡碰壁,同时又不得不经常面对英美对日妥协的困境。尽管如此,国民政府从英美基本利益出发,认定它们必将与日本发生冲突,始终把它们作为中国最主要的依靠对象而坚持不懈地展开外交工作,

① 刘天纯:《远东慕尼黑阴谋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1985年第4期;胡之信:《1937—1941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求是学刊》1981年第4期;梁长平在《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演变》(《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中将1937—1945年之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第一阶段,英、美对日本侵华以“不干涉”“不承认”的绥靖政策为主流。

② 王建朗:《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③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12、13章。

④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章。

最终,英美成了中国对日作战最主要的同盟国。就这一时期外交方针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来看,一些研究者指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是灵活的、基本成功的。^①

2.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与香港九龙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与中国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作为支持中国抗战的一种表示,英美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于1942年10月10日宣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和有关特权。不久,英美与中国就废旧约、订新约问题展开谈判。中美之间的谈判比较顺利,但中英之间的谈判却波折不断。有关香港九龙问题的交涉作为谈判的最大难点尤其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中方对香港和九龙问题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香港问题是回避政策,实行冷处理;九龙问题是谈判中争执最为激烈的一个焦点,但中方未能坚持住自己的立场,最终作了让步。然而中方并未放弃收回香港九龙的决心,而是准备战后处理。^②也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对收回新界、九龙问题一度曾比较坚决,但由于英国顽固坚持殖民主义态度,国民政府不得已作出退让,在声明保留日后再议的权利之后,放弃了即时收回新界的要求,中英新约才得以成立。^③有学者指出,美英政府在对华谈判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英国对重大悬案的保留,是此后中英关系冷淡,国民党政权向美国一边倒的主要原因之一。^④

如何评价1943年新约?一些学者认为,对此应予充分肯定,中国人民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延续数十年,抗战期间得以实现,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尽管此后在实际上中国并未取得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这是基于国力差距而不再是条约的规定。就法理而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已经得到确认。^⑤有的学者还对独立与平等进行了区分,指出,既然中国沦为

① 章百家:《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初探》,载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2),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② 王真:《1942年中英新约谈判述论》,《民国档案》1997年第2期。

③ 刘存宽:《1942年关于香港新界问题的中英交涉》,《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李世安:《1943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陶文钊:《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④ 吴景平:《中美平等新约谈判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⑤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半殖民地是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起点,那么中国摆脱这种状态也应以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为标志。虽然新约签订后,中国与强国之间仍然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取得独立地位。独立与平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独立是指一个国家政治上拥有主权。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不平等的。承认平等新约的意义在于肯定全中国人民流血奋斗的成果。^①

对此持异议者指出,新约的签订具有进步意义,但它并不标志着中国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真正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新约内容简单,废除的主要是领事裁判权和其他有关的政治特权,外国在华投资设厂、经商、办学、设教堂等问题基本没有涉及。有的不平等条约(如片面最惠国待遇)仍然保留了,有些涉及英美实际利益的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战后,因此,中国的主权是不完整的。而且,条约签订后,英美并未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雅尔塔会议便是明证。再说,英美当时所放弃的特权绝大部分为日本所占有,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能说中国已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②

还有学者指出,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英国的态度不如美国开明,它不仅在香港九龙问题上坚持顽固立场,而且对其他一些特权,如经营商业的国民待遇、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等,也是迟迟不愿放弃,只是由于中国方面的努力和坚持,英国才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些特权。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表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③

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美关系

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与史迪威事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对史迪威本人的在华活动,学者们基本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第一,史迪威抵制了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第二,史迪威促成了美国政府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史迪威的若干主张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抗战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并在一定程

①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② 王洪:《1943年“中美平等新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评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③ 王真:《1942年中英新约谈判述论》,《民国档案》1997年第2期。

度上影响了当时的中美关系。^① 还有人评价史迪威是一位为人类正义事业而战的勇士,卓越的军事将领,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中国人民的朋友。^②

对史迪威事件,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史蒋在缅甸战役、租借物资分配、领导权等问题上产生矛盾的原因。研究者们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一种认为史蒋矛盾不是个人性格上的冲突,而是美国与国民党对日作战基本战略方针问题上的冲突。美国以战胜日本为首要目的,要求蒋介石全力抵抗日本侵略,并曾企图增强和发挥共产党部队的抗日作用。而蒋介石此时已开始把战后与中共斗争的考虑放在首位,他总想保存实力,而不愿积极抗战。这是史蒋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③ 魏楚雄更进一步指出,史蒋矛盾不是美蒋矛盾冲突的原因而是结果,史迪威被召回不是美蒋矛盾冲突的结果,而是美蒋矛盾缓和的结果。^④ 也有一些学者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史蒋矛盾,指出它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益斗争。蒋介石虽有企图借美国武器武装自己军队,待抗战胜利后进攻中共的一方面,但其抗战方面是主要的。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却不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以租借援华物资相要挟,让中国交出军队指挥权。蒋介石拒绝这一要求,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利益和主权。史蒋矛盾的实质,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⑤ 近来还有人提出,美、中抗战总体战略上的差异是“史迪威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美国从当时世界格局和自身安全出发制订了“先欧后亚”总战略,而国民政府则与此相反,蒋介石集团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希望美国采纳自己先解决日本后解决德国的总战略。双方既定战略的对立,是史蒋矛盾爆发的根本原因。^⑥

史迪威事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罗斯福本想通过扩大

① 刘迎红:《史迪威与抗战后期中美关系》,《求是学刊》1997年第3期。

② 李振华:《史迪威与中国抗日战争》,《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年第1期;倪良端:《同中国人民一道抗日的史迪威》,《黄埔》2005年第6期;刘建美:《史迪威将军与中国》,《党史纵览》2004年第5期。

③ 魏楚雄:《论史迪威事件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章百家:《抗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经验——由史迪威在华经历所想到的》及金光耀:《蒋介石与史迪威和陈纳德的关系》,均载史迪威研究中心编:《史迪威将军与中国》,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④ 魏楚雄:《论史迪威事件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⑤ 吴明:《中国现代史学会七七抗战5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⑥ 李亮:《“史迪威事件”原因再探》,《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史迪威的指挥权来挽救中国战场正在出现的危局,它是抗日战争中美国在华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美国不得不召回史迪威标志着美国逼蒋抗日政策的倒退,此后美国不再对中国战场的军事价值寄予厚望。史迪威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军事考量转向对战后的政治考量的一个起点。^①

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使华调处国共矛盾是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研究中的又一个热点问题。美国在抗战后期开始卷入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赫尔利使华便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接受中共的五点建议,过去曾被认为是一个骗局。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赫尔利是认真的。因为赫尔利调处国共矛盾的目的,是要使中共武装置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建立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民主联合。^② 赫尔利认为中共五点建议是使中共交出军队的唯一文件。赫尔利后来变卦,转而支持蒋介石的三点反建议另有原因。一是他认定,如国共要求不可调和,他的使命是必须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二是由于他对中国情况的无知,对国共两党分歧的要害究竟在哪里缺乏了解。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赞成把赫尔利的行为看成个人行为,而认为赫尔利基本上是在执行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但赫尔利毕竟是赫尔利,他在执行罗斯福的政策时加上了个人的创造与发挥,甚至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来,从而使他所执行的政策带上了个人色彩。如赫尔利曾对蒋介石忘乎所以地表示,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装备精良的师团可以轻易战胜中国共产党军队,但罗斯福从未主张战后用军事手段消灭中共,他所担心的正是中国会爆发内战。赫尔利的做法无疑把美国政府的扶蒋抑共政策发挥到了极致。^③ 陶文钊还认为,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转变并不仅仅是由赫尔利使华导致的,而是1944年9月到1945年4月期间逐渐转变的,具体事件包括:史迪威的召回,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根据罗斯福和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的命令对驻华美军及战略情报人员与中共合作意向的调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改组,赫尔利调处的失败,赫尔利与驻华职业外交官的争论。^④ 也

① 王建朗:《试析1942—1944年间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演变》,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2),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② 牛军:《赫尔利与1945年前后的国共谈判》,《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

③ 陶文钊:《赫尔利使华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章百家:《美国对华政策新解——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④ 陶文钊:《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

有人以1944年12月底为界,把赫尔利使华分作两个阶段来观察。认为他在前期为国共合作做了一些努力,客观上有进步作用,但他在后期开始歪曲和偏离罗斯福给他的使命,背离了罗斯福赞成的灵活的现实主义对华路线,把美国对华政策推向极端。^①

4.《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对华援助与《苏日中立条约》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背景下,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不少学者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背景、经过进行了梳理,指出苏联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除了其对中国正义事业支持的国际主义出发点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通过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阻止日本“北进”计划的实施,避免苏联陷入两面作战的危险局面。^② 对该条约所产生的影响及评价,以往一般认为中国是这一条约的受惠国,苏联只是施援者。但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与中国一样,苏联也是这一条约的受惠者。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在苏联的迫切要求下签订的,中国对此并不积极,而倾向于签订中苏互助条约。只是在苏联施加了如中方不签此约苏方就不提供军事援助的强大压力后,中方才同意订立这一条约。作为条约的附加条件,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这就缓解了苏联对日本联华反苏的担忧。所以,这一条约对苏联也是有利的。^③ 近来还有学者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中苏互助条约》的交涉过程及相互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着重分析了国民政府在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从首先提议,到不愿订立,再到急于签订的种种原因。^④

在苏联对华援助问题上,学者们一致肯定苏联是抗战前期给予中国最大援助的国家。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焦点在于苏联对华援助的总额、笔次及使用情况,过去一直有多种说法。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澄清了过去在这

① 王建辉:《赫尔利是哪一条对华路线的代表》,《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② 张小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及对中国的影晌》,《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2期。

③ 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4章;张小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及对中国的影晌》,《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2期。

④ 孙艳玲:《抗战前期中国争取同苏联订立互助条约始末——兼析〈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个问题上的若干讹误,得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① 学者们还认为,苏联给中国以巨大援助,自己也因此而深受其利,因为中国的抗战反过来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苏联的压力。此外,苏联在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时,中国以农矿产品偿还,其中许多农矿原料是苏联进行工业和国防建设所必需的,因此,在中苏关系中,中国的地位并不仅限于受援国。^②

《苏日中立条约》可说是中苏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极其引人瞩目的问题。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有学者认为,《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是当时苏联外交的一个胜利,因为它利用并加重了日德之间的裂痕,因而当德国进攻苏联时,条约保证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这就使苏联能在盟国的支持下集中力量对德作战,保证了对德战争的胜利,从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着全局意义。但苏日互相表示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却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③ 对《苏日中立条约》能否起到增强苏联安全的作用,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苏联红军能在最艰苦的年代无东顾之忧,甚至能从远东抽调兵力对付希特勒,绝不是中立条约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能是因为中国英勇抗击了日军主力。^④ 还有人认为,条约是苏联从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放开原则,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姑息日本侵华的产物。它既满足了日本占有中国东北的要求,又切断了日本经过外蒙进犯苏联的通道,是最好的绥靖日本、促其南下的手段。因此,该约对远东国际关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亚洲战场和中国的抗日战争都产生了直接影响。^⑤

还有学者就《苏日中立条约》对中苏关系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条约的缔结标志着抗战初期呈上升趋势的中苏关系开始由顶点下

① 李嘉谷:《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贷款与军火物资援助》,《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许碧晏:《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借款数值的总额、笔次、时间的考证》,《蒙古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优秀论文集》1998年10月。

② 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7章;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章。

③ 李嘉谷:《中苏关系史研究二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第6章。

④ 王春良:《评日苏中立条约和雅尔塔协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倪维钧:《试论1937—1941年的美苏援华》,《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

⑤ 厉声:《苏日中立条约试析》,《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第2期。

滑,条约所起的作用正如签订该约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所言,冷却了中苏关系。^① 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对中国抗日军民心理上造成了重大打击,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就战场形势而言,《苏日中立条约》便利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在中国各战场纷纷发动攻势并加强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因此,《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当时抗日战争的消极影响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② 还有学者指出,条约的签订一方面表明苏联的对华政策出现了重大倒退,使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另一方面在客观上造成了美蒋加速靠拢的形势,中国抗战也因日美冲突的升级而逐步改变了独木支撑的局面。^③

5.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对 1945 年 8 月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持肯定态度,回避苏联在订约谈判及条约本身内容上所体现的大国沙文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分为二的评价,认为苏联此举既有协助中国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有学者指出,这一条约是为加强中苏善邻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和维护远东和平而订立的,具有积极的因素。该条约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日帝国主义势力。但该条约将《雅尔塔协定》合法化,苏联力图恢复沙俄在华失去的权益,反映了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对于中国革命,这一条约也产生了双重影响。^④

有的学者较多关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消极影响,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翻版,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条约的成立最典型地反映了大国政治交易之下弱国可能的遭遇。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强各国均已公开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废弃不平等条约之时,苏联作为一个公开自诩为民族解放运动大本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坚持要在战争中赢回沙皇时代的殖民主义荣耀感,并不惜为此损害弱小国家的

① 王真:《苏日中立条约与战时中国》,《民国档案》1995 年第 3 期。

② 李嘉谷:《论〈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实际影响》,《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1 期。

③ 陆文培:《试论〈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抗战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94 年第 1 期。

④ 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 章。